



外交风云

亲历记

张颖 /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

我与章文晋

随章文晋出使美国

“红都女皇”真相



亲历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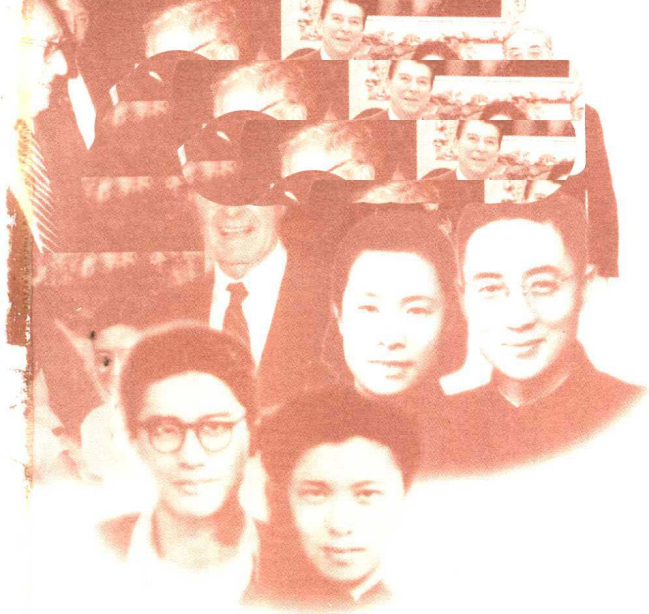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亲历记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外交风云 亲历记

张颖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风云亲历记/张颖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16-04126-7

- I. 外…
- II. 张…
- III. ①张颖—回忆录②外交史—史料—中国
-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705 号

外交风云亲历记

张 颖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80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10 000
书号:ISBN 7-216-04126-7/K·413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0.5
插页:1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第一部分

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 /3

第二部分

我与章文晋 /37

随章文晋出使美国 /48

第**一****节 白宫的外交 /48**

一、呈递国书就遇到麻烦 /48

二、参加白宫的社交活动 /53

三、中国总理访问美利坚 /57

四、里根总统夫妇访问中国 /70

五、我所认识的五位美国总统夫人 /75

第**二****节 美国的高官富豪 /78**

一、与舒尔茨夫妇的交往 /78

二、与基辛格博士的缘分 /83

三、伍德科克夫妇 /90

四、在农业部长家做客 /96

五、水门饭店的老板 /98

六、柯恩先生 /101

七、夫人們的社交 /103

第 三

节

使馆内外 /107

一、一个专职大使夫人 /107

二、大使官邸用上了 124

三、在美国庆祝我国国庆 35 周年 /124

四、章大使的伙伴们 128

五、我们在美国的穿着 136

第 四

节

中美文化交流 /142

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览 /142

二、艾奥瓦的国际笔会 /145

三、吴作人、萧淑芳画展 /149

四、“一碟盐”餐馆 /153

五、奥尼尔戏剧中心与老艺术家怀特先生 /158

六、洛杉矶奥运会片断 /162

附录一 深切怀念章文晋先生 /165

附录二 难得的纪念品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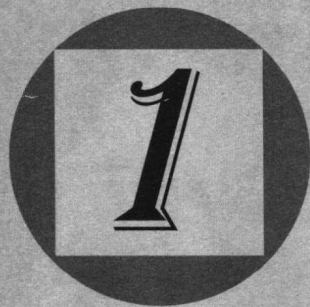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

“红都女皇”真相

——维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177

- 一、旧事重提 /177
- 二、江青初见维克 /193
- 三、移师广州 /207
- 四、饭前饭后 /222
- 五、“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 /230
- 六、“我是轮人之女” /245
- 七、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 /255
- 八、批《武训传》评《红楼梦》 /268
- 九、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 /282
- 十、谈话记录的是非 /297
- 十一、周总理与《谈话记录》 /312
- 十二、旁听审判江青 /319
- 十三、题内题外 /328

第



部 分



新婚时的龚澎与乔冠华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备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屋内仅能放下四张小竹床，加上一张小桌子就挤得满满的了。那时还有刘昂、陈舜瑶与我们同住，我们4人都是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机要、龚澎外事、舜瑶宣传、我是文化。龚澎和我是对外活动的，都用《新华日报》记者名义。我们工作的性质有差



1940年从延安到重庆不久的张颖

异,但生活在一起很融洽很亲密。龚澎比我大8岁,我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她总是很谦虚地笑着说:我比你年龄大,但其他方面都一样。那时我们虽然都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一般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也在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有哪一天,谁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为她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呢?那时重庆不仅有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哩。所以,不管多么晚,我们都要等对方回来了,才一起睡下。我们常常躺在各自的小竹床上,龚澎和我头顶着头,说悄悄话。虽说工作性质不同,但对在外边遇到的事可以互通消息或交换点看法。有时谈得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刘昂更是大姐姐了,就会说我们几句:明天不工作啦,快天亮了还说个没完。

重庆,那时候真使我们讨厌透了,夏天酷热,冬天阴雨绵绵,平时浓雾罩得人伸手不辨五指。我们住的曾家岩50号,在特务的层层包围之中。50号这座房子是三层小楼,是国民党“配给”恩来同志的住宅,所以当时也被称作周公馆。邻居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而这座三层小楼还不是全给我们使用。二层楼还住着国民党的所谓“政工队”,二层楼连到天井处,有一个小晒台,这也归政工队。所以他们的人可以站到小晒台处,往上看到我们三楼的办公室,往下可看到我们一楼的会客厅。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监视我们的好地方。更有甚者,那个政工队还有不少女青年,穿着背心短裤,在那个晒台上嘻哈玩耍,有意勾引我们的男青年。有些从农村刚参军不久就调到重庆当勤务兵或警卫员的青年,还没有见过这些哩,终于有一天一个警卫战士被她们勾引跑了。

当年重庆的曾家岩和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原本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许多小杂货铺、小饭馆、烟摊都被国民党特务把守着,只要是从50号出来的人,一出门口拐弯走到胡同口,他们就会盯梢、尾随。时间长了,互相都认得了。有时我们当面骂他们:你们是狗吗?老跟着我们干什么?他们挺不要脸的,还冲着点头,真把人给气死了。因此我们出门得想方设法,把这些狗尾巴甩掉,不然把尾巴带

到和朋友约会的地点,会对朋友很不利。我们常常先到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会见第一个朋友,然后再从营业部到别的地方去。龚澎很机敏,适应那样复杂的工作环境;她很快总结经验,告诉我,不能常常都先去营业部,特务照样会发现的。她说最好先到公开机关,比如先到与国民党有关的地方去找个人,她常常先去国民党的国际新闻署或是美国新闻处,倘若一段时间这样做,会使得特务们麻痹一阵。我当然也跟她学习,先去公开机关,比如人多又杂的中苏文协之类的地方。这样特务要盯梢就困难多了。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他对龚澎很佩服,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



1941年,一群外国记者走在嘉陵江边通往珊瑚坝机场路上

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情况。她广交朋友,成为重庆涉外新闻界中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许多记者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她的好朋友。前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些新闻界的名记者、名报人,谈起龚澎他们都称赞不已。有一次在宴会上,我与苏尔兹伯里坐在一起,我们并不相识,没有多少可谈的话题,我偶然提起龚澎,他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说龚澎是外交界少有的人才,那一晚上我们一直在怀念龚澎。可见她在外国新闻界的影响。

龚澎结交了许多外国新闻界的朋友,她不仅向他们宣传我们的观点,也向他们了解许多情况,每隔几天她都向周恩来同志写简单的书面汇报,有关事和人的都写。周恩来同志也不时地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也提出一些建议供周恩来同志参考。周恩来同志根据情况,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予以接见,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周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态度,一直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当时的工作极为繁忙,那时候我们能够经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



1941年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公寓就餐。右一为格拉姆·佩克

办公时间一般都在午夜 12 时到凌晨 4 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这段时间都不能睡，要在办公室里等着，因为恩来同志不定在办哪一件事时要问到哪个人，就会把谁叫到他那里，或修改文件，补充情况或接受指示。这时我们有的继续白天没完的工作，有的看看书报，偶然有个别同志实在磕睡了，就会聊聊天或打一会儿扑克牌。龚澎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干她的工作，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多啊。更多地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又继续工作。我记忆较深的一段时间是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间，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发表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候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她的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你们还给我煮鸡蛋。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后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了。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那时候，我们都多么年轻呵，那是多么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

龚澎原名维航，1914 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龚家是安徽的一个大家族。父亲龚镇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母亲是广东人。1935 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那时候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龚澎到重庆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是她以后告诉我,我才知道一些情况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随后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当时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又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的感觉,要是生了病就更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都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我们许多工作则仍然在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因怕传染给大家,于是我住到红岩半山腰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

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得了病，她连发了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医生说是感冒。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未退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最后昏迷不醒。同时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因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在臀部开了一刀后，挤出脓血一大盆。烧倒是退了，可伤口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也没有合适地方住，只得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来。她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只得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痛，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小草房时，她见到有我和超俊做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么事都干不了，她逐渐地不耐烦，发牢骚，甚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重要新闻，我爱看小说，又给她讲讲小说里的事。过了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的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所住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发响。龚澎很怕霹雳声，我也睡不着，就想起床和她说说说话。突然轰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炸



龚澎与邓颖超